



周 恩 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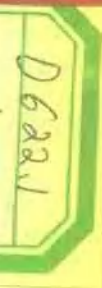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

李方

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翻印

· 一九五七年九月



各位代表：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以来，已經整整一年了。这是偉大的轉变的一年。在这期間，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胜利，使我国社会生活發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建設也获得了巨大成績，使我們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我国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中，我們取得了許多宝贵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国社会主义事業的繼續發展更加有了保証。这一年，就是以这些偉大光輝的成就載入我国史冊的一年。

关于一年来的政府工作，国务院决定由我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报告。我的报告，是依据毛澤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針，来檢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見。这个报告分为五个部分：（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建設；（3）关于人民生活；（4）关于国家基本制度；（5）关于国内外团結。

一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業、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在生产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二亿二千万农戶和五百多万个手工業者的个体經济已經变为集体經济。七万戶的私营工業企業已經变为公私合营企業，將近二百万戶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經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

生产資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沒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沒有發生混乱，社会生产沒有下降。恰恰相反，我們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1956年的自然灾荒，不仅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灾荒，也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灾荒，被灾田地約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約七千万人。在全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农业就经历了这样严重灾情的考驗。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全国农民發揮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实现了增产的要求。195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約为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計劃最后一年的指标；粮食（不包括大豆）的产量为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計劃最后一年的指标。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于大家忙于組織合作社和积肥造肥；以及兴修水利等基本建設，并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产粮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农村副業的發展一度受到影响。1956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灾最重，产量比1955年减少了。但是，在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除了灾情严重的地区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农户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对于灾区，政府去年用于防汛、搶險、堵口、复堤、救济等項的支出和發放生产救灾貸款的款項共达八亿六千万元，从去年七月到現在，向灾区調运的粮食，增加了七十亿斤，而

農業合作社的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1956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建設和生产同时增長，生产資料的需要驟然增大，因而使各种器材，特别是建筑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应出現了緊張情况。可是，尽管如此，1956年手工業和公私合营企業的生产和營業，也都得到了發展。这一年，手工業总产值达到一百一十七亿元，較1955年增長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营企業的工業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九十一亿元，較1955年这些企業的总产值增加了約百分之三十二。1956年，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的零售总额达一百一十亿元元，較1955年这些企業的零售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業实行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政府已經完成了給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对私方人員也作了大体安排。

人們知道，当小生产一旦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經濟以后，資本主义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础。可以这样設想，在農業合作化和手工業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会主义經濟的大發展中，如果政府对私营工商業不采取一視同仁、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針，或者私营工商業者不参加公私合营而拒絕改造的話，那么，二百多万户私营工商業的生产和營業不仅不能得到發展，并且必然会处于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而私营企業的职工和一部分从業人員就会遇到失業和轉業的困难。这不仅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对工商業者更加不利。党和政府从开国以来，就把私营工商業放在国家的統筹安排之內，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营工商業者就在1956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接受了全行業公私合营的办法，从而使全国私

营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能够同时基本上完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的历史发展所准备好了的。19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接着，我们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挑战，破除了我国一部分人的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肃清反革命运动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些运动的胜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时间内，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些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进行的，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不能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由此可知，对于五大运动无论就其成绩来说，也无论就其进行的形式来说，都是不应该怀疑的。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地进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供销

小組、分散生产联合經營等低級形式到手工業合作社的高級形式、从小規模的手工業合作社到規模較大的手工業合作社的發展过程。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經過了从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到部分的公私合营再到全行業的公私合营的發展过程。同时，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联系配合起来进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历史發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万万人民生活的历史大变革后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不仅能够正常进行而且能够获得很大發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發生过一些偏差和錯誤的。政府对于这些偏差和錯誤，有的已經作了檢查和处理，有的正在檢查。我們欢迎全国人民繼續提出批評和建議。当然，我們在檢查偏差和錯誤的时候，要分析主觀的和客觀的原因，要分析在当时那些偏差和錯誤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無法避免的。这样，我們才能判明这些偏差和錯誤的性質、程度和範圍。对于那些在当时条件下确实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錯誤，我們必須引以為戒，坚决糾正；对于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損害的人，我們應該公开向他們道歉；在运动中沒有处理完畢的問題，現在應該由有关机关迅速予以处理。

但是，历次运动中發生的偏差和錯誤，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績的。以思想改造运动來說，由于这个运动也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某些問題的处理是比較粗糙的，因而損傷了一些从旧社会来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帮助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基本上

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在这次整風运动中，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数都表示贊成社会主义，就是証明。再以肅清反革命运动來說，在政府历年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計有以下四类：（一）因积恶累累民情極大而判处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点八，其中絕大多数是从解放后到1952年判处的，这在当时是絕對必要的；（二）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其中已經刑滿釋放或者安置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現在在押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三）实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經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現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点一；（四）逮捕后寬大处理、教育釋放的占百分之八点九。由此可知，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是經過劳动改造或者寬大处理而得到釋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們已經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其余仍在劳动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們認罪守法，老老实实在地接受改造，也将会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政府的初步檢查，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偏差的是極少数，而絕大多数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認為肅反的偏差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完全沒有根据的。毛澤东主席已經提出还要对这一运动进行一次檢查，我們相信，檢查的結果会繼續証明这一点。

过去进行的五大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組成部分。因此，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錯誤来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即使是个別單位甚至个别地区發生的錯誤比較严重，也依然不能否定这些运动的成果。党和政府每当提倡一种运动的时

候，都是根据客观的迫切需要，经过慎重研究和典型试验才提出的，而每次运动又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个别的。有人認為，如果我們說这些运动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个别的，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实际上，这些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号，就是为了夸大錯誤、抹煞成績，引导一些立場不穩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这些个别性質或者部分性質的偏差和錯誤，看成是这些运动的根本性質或者全面性質的錯誤，以达到他們动摇革命运动成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我們說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胜利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众階級斗争基本上結束了，但是这并不是說，階級斗争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着重地提出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說，現在就沒有敌我矛盾了。应该指出，目前在國內还有階級存在，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虽然已經早被消灭，但是这些階級的分子，还正在劳动中、生活中改造着，而他們固有的階級思想和階級感情，还不可能完全改变。私营工商業者的絕大部分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是由于他們还拿定息，对工人階級还有剝削关系，因而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張或者贊成把股息延長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說股息不是剝削，仅仅是“不勞而获”，說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分子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別，甚至說“官僚主义是比資本主义更加危險的敌人”。这些謬論都是由于資產階級的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剝削

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圖打掩护。有少数资本家主張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更是拒絕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露骨的表现。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资产階級还存在着兩面性嗎？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說明资产階級分子还有繼續改造的必要嗎？对资产階級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他們进行自我批判，逐步改变资产階級的立場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們得到“脫胎換骨”的本質改造。要作到这一点，又非經長期的改造功夫不可。这对絕大多數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業者來說，又有什么不好呢？現在不是已經有越来越多的工商業者認識到了这一点嗎？由上述情形看来，在人民內部矛盾中，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階級同工人階級对抗的一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階級斗争，更不必說在人民內部之外，还存在着我們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国外的帝国主义的敌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經明白看到的，在这次整風运动中，有思想斗争，也有政治斗争。因此，当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时候，絕不能無視还有階級斗争的存在，也不能無視还有敌我矛盾的存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繼續进行和徹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們今后的一項重要任务。

二 关于社会主义建設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在我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中，我們已經正确地规划了建設和改造相結合的步驟。而1956年，伴隨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有了一个躍进的發展，經济事業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都

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了前三年增长的总和。

现在我举出一些数字说明这个情况。

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而1956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正是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五百八十六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标。从主要工业产品看，钢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金属切削机床的制造，前三年由于调整设备和改变型号的原因，虽然在台数上比1952年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新的品种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6年，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又比1955年增加了一万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电力、煤炭、石油、化学肥料、水泥等重工业产品，1956年的产量比前三年的年产量都有较多的增加。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重要新产品也都是在这一年制造成功的。轻工业生产由于1955年农业丰收的有利条件，增长速度很快。例如，棉纱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万件，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万件；棉布的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万匹，而1956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万匹；食糖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将近十一万吨。

1956年，我国的农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如前所说，总产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超过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亿八千万元的水平。1956年，在国家

和農業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農業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前三年共開墾荒地三千六百萬畝，而1956年就開墾荒地二千九百萬畝；前三年擴大的灌溉面積共四千一百多萬畝，而1956年就擴大了一億多畝。

1956年全國完成了將近一百四十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額，等於五年計劃規定的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因而改變了前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只完成五年計劃一半稍多的情況，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達到百分之八十六，這就保證了第一個五年的基本建設計劃能夠超額完成。1956年新增加的鋼的生產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萬噸；新建和修復的鐵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產和建設的迅速發展相適應，1956年在運輸方面和貿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發展。全國現代運輸工具前三年的貨運量共增加了一億一千二百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萬噸；商業機構零售總額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億元，而1956年就增加了六十二億元。

1956年文化教育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顯然，1956年的建設成就是極其巨大的。這就使國家有比較充足的力量來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從而加強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陣地，鞏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又保證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有可能比較順利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從而準備了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有利條件。

1956年政府對國家建設工作的安排，總的說來是正確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點和錯誤。這些缺點和錯誤，將要在李先念、薄一波兩位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分別作的關

于国家預算的报告和关于国民經济計劃的报告中詳細指出。1956年預算开支中的某些項目和国民經济計劃中的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从財政方面說，执行国家預算的結果，当年支出超过当年收入十八亿三千萬元，动用了历年財政結余十六亿五千萬元，并且从銀行透支了一亿八千萬元，銀行發行貨幣也多了一些，因而动用了庫存物資大約二十億元。从經濟和文教方面說，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同时，职工的人数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职工的工資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虽然1956年我国生产資料工業的产值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資料工業的产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这两种物資的供应都較緊張，并且减少了国家的物資后备力量。在造成物資供应緊張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設投資額大了一些，“攤子”鋪得多了一些，这样就多增加了財政的开支，多增加了职工人数和工資總額，也就多增加了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消耗。

对于1956年的基本建設工作，我們應該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許多建設項目在前三年已經完成了土木建筑工程，需要在1956年进行大量的設備安裝工程，另有許多項目已經完成了設計和施工准备工作，需要在1956年开始大量施工，并且还由于設計和施工力量的壯大，設備自給能力的增長，需要在1956年安排一些新的項目，这样，就使基本建設的項目大大地增加了。現在从建設項目来看，大多数是安排得恰当的，有小部分动工过早了，或者进度过快了，也有个别項目，是安排得不恰当的。不恰当的項目，显然是錯誤的。那些动工过早和进度过快的項目，在

当年确实造成一些损失，但是，对于長远的建設事業还是需要的。同时，有一些項目，主要是一些非生产性的項目，由于建筑标准过高，造成不少浪费。这些，都应该引为教訓，今后力求避免。

由于基本建設投資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資供应緊張的情况，我們在1956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經开始察觉，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应緊張情况的繼續發展。以后在編制1957年的国民經济計劃草案和国家預算草案的时候，我們就吸取这个教訓，縮減了一部分基本建設投資，适当地增加了国家的后备。

这次提交大会申議的1957年度的国家預算草案和發展国民經济計劃草案的各种数字表明，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是以既積極又充分可靠的步驟向前發展的。1957年的国家預算收入比1956年增長近百分之二；为了避免像去年那样在財政上出現赤字的现象，国家預算支出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四。1957年的工業总产值比1956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五，达到六百零三亿元。農業总产值比1956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九，达到六百一十一亿元。基本建設投資縮減为一百一十一亿元，它虽然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計劃原定的1957年投資还多十四亿元，五年合計，仍然超过五年計劃原定数約五十亿元。在1957年已經过去的五个多月時間內，預算和計劃的执行情况，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厉行增产节約，貫徹执行勤儉建国方針，爭取農業丰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灾害，那么我們就能够順利地完成1957年的各項指标，也就能够保証完成和超額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从而奠定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议，国务院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正在由有关部门具体制订中。

应该指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所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援助分不开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共有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苏联给我国提供了大量的长期的优惠贷款，并且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这种真诚的援助，值得我们再一次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还有人企图抹煞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计。

有人認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1956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1955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1956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

是屬於局部性質的缺點。即使以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來說，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質的缺點。因此，決不能說1956年的建設是全面冒進。1957年，由於去年農業收成的情況不好，同時國家的財政和物資的後備力量也有減少，在這種情況下，適當地放慢建設的步驟，積蓄力量，準備今後更好地前進，是完全必要的，這決不是全面冒退。我們應該懂得，任何事情都不會是直線發展的。隨着客觀條件的變化，發展速度總會有快有慢，並且常常會出現不平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也是這樣。尤其是像我們這樣人多且窮的國家，由於農業的比重很大，自然災害時常發生，要求國民經濟年年都毫無起伏地按照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有人認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壞了，這是完全錯誤的。無論從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基本建設、文化教育或者財政收支那一方面來看，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壞了。以1957年的計劃數字同1952年的實際數字作比較，我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一點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億元。以鋼的產量來說，第一個五年合計將達到一千六百三十萬噸，而舊中國包括日本侵略時候的東北在內，從1900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計的鋼產量不過七百六十萬噸。當然，拿目前我國鋼的產量同工業發達的國家的產量來比还是很低的。因此，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方針，今後仍然應該繼續堅持。我國1957年的農業計劃如果完成，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將增長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億六千

萬元。以糧食和棉花來說，1952年到1956年五年間的实际產量合計，糧食為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億斤，棉花為一億三千万担，而旧中國从1932年到1936年五年間是我國解放前農業收成比較好的年份，糧食產量合計只一萬三千億斤，棉花產量合計只六千零五十萬担。不要忘記，在1952年到1956年這個期間，還有兩個大的災荒年。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內，我們開工建設的有八百多個限額以上的工業企業，許多水利工程和鐵路工程以及長江大橋工程等等，規模都比較大，技術比較新，其中由蘇聯幫助設計和供應設備的一百五十六項建設工程，在技術上都是頭等的。這些建設工程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和農業生產的發展，不僅在第一個五年內已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後將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些建設工程，多數都是旧中國時代所不能想像的。第一個五年期間鐵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國民黨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統治期間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在這期間也有了巨大的發展，例如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第一個五年合計為二十八萬人，這就為新中國培養出大批的建設人材，而旧中國从1912年到1947年，三十六年合計不過二十一萬多人。拿財政的情況來說，第一個五年合計的財政收支各為一千三百六十九億一千四百萬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國外借款收入三十一億元，只占國家預算收入的百分之二點三。這充分地說明了我國基本上是依靠內部的積累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的。五年的財政支出，用於國家建設事業的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經濟建設事業和社會文教事業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國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這就充

分地証明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計劃，是和平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計劃。我国在进行大規模建設的同时，由于生产的發展，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善，这一点，我將在报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說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偉大成就，是無可否認的。那种說第一个五年計劃搞坏了的人，他們对社会主义事業抱着敌对的态度，故意抹煞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样的人，他們最不高兴社会主义計劃經濟而向往資本主义經濟。但是，他們的困难是，全国广大人民并不站在資本主义那一边，而是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

有人認為統購統銷糟透了，这是直接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社会主义的計劃經濟在中国是为六万万人的生活着想的，这同資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只顧少数人發財享受不顧多数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国人口众多，經濟还很落后，生活消費品的供应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国的農業，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照顧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須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顧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必須准备应付特別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我国的工業和运输業的建設正在大規模地进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种情况，說明了在我們这样的国家里，如果不对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費品实行統購統銷，进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無法保証，社会主义建設的事業就無法順利进行。因此，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費品的統購統銷，是我国社会主义經濟在分配方面的一項重要政策。四年来实践証明，这个政策保証了城乡人民都能够得到他們